

西安碑林全集

開成石經

第一〇七卷 周易



開成石經概述

盧桂蘭

我國遠在上古時代，已陸續產生了豐富的文化典籍，其內容包括天文、地理、哲學、歷史、文學、音樂、禮儀等諸多方面，概括起來爲《詩》、《書》、《禮》、《易》、《春秋》、《樂》，當時稱之爲『六籍』。

以孔子爲代表的儒家，對『六籍』進行了整理與修訂，使其更符合儒家的思想和倫理道德的要求。孔門弟子將孔子修訂的『六籍』稱爲『六經』，後世也稱其爲『儒經』。在戰國時，『六經』已廣爲傳播。

自西漢武帝時開始，經學大盛，《詩》、《書》、《易》、《禮》、《春秋》五經爲學校的教課書，學生的必修課，也是朝廷選拔官吏的標準尺度。因此，朝野上下對『五經』（《樂經》於秦代失傳，故稱『五經』）更爲重視。爲避免學經過程中傳抄錯誤，將經文刊刻於石，作爲範本，實爲傳播『五經』之上策。故此，在東漢靈帝時首次刊刻經文於石，稱爲『石經』。因刻於靈帝熹平四年（一七五），史稱『熹平石經』。

三國曹魏時，齊王曹芳效仿東漢，重經尊儒，於正始年間（二四〇——二四九）以古文、篆文和隸書三種字體刻立石經，史稱『三體石經』或『正始石經』。

唐文宗開成年間，再次刊刻『開成石經』，其規模之宏大，內容之豐富均遠遠超過了前代。由於其後各朝各代的有識之士的保護，雖歷經滄桑，仍保存基本完好，至今巍然屹立於古城西安，成爲聞名遐邇的西安碑林的重要組成部分。

茲從以下五個方面對『開成石經』的概況作一介紹。

一、『開成石經』刊刻的歷史背景

唐代的三百來年間，在思想領域里，基本上是儒、釋、道并興。初唐，道教和佛教分別受到唐太宗李世民和武則天的推崇，道觀、佛寺數量大增，且有不少觀、寺爲皇家官辦，皇親國戚、文武大臣中的道教和佛教徒不乏其人。但是，從總的情況看，無論是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還是外域傳入的佛教，始終未能取代儒學的正統地位。

早在唐高祖李淵在位時，於武德二年（六一九）下詔在國學內建周公廟和孔子廟（當時稱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繼位後，雖大力提倡道教，自稱爲老子李耳的後代。但同時他也深知儒家的思想體系和道德標準更適合於朝野上下絕大多數人，特別是知識分子의 思想和感情，更有利於鞏固其政權，所以他在抬高老子地位的同時，十分強調老子和孔子的師生關係（相傳孔子是老子的學生），借以提高孔子的歷史地位和巧妙地提高儒學。貞觀二年（六二八）唐太宗接受尚書左僕射房玄齡等人的建議，尊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停祭周公。貞觀四年（六三〇），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誤，詔顏師古於秘書省考訂《五經》文字，編成《五經定本》一書，并作爲官書頒行全國，令儒生們學習。自此以後，儒家諸經文字完全統一，不再有因文字的不同而解釋各異的弊端。

唐太宗又以儒學自東漢以來門派衆多，章句繁雜，義理不一爲由，令孔穎達與當時的一些著名經學家一起編撰《五經正義》（即《五經義疏》）。貞觀十六年（六四二）書成。唐高宗永徽二年（六五一）又詔中書省和門下省及國子三館有名望的博士和學士——諸如長孫無忌、張行成等人，對《五經正義》一書再次進行修訂。永徽四年（六五三）頒行全國。從此後儒經義理全依《五經正義》所說，否則，被視爲異端邪說。正如史書所記：『自《五經定本》出，而後經籍無異文；自《五經正義》出，而後經義無異說。』

教育和人才的選拔，乃歷朝歷代之大事。自隋朝開始，朝廷實行開科取士，即科舉制。唐朝繼承了隋代開創的這一選拔人才的制度，而且更加完備和發展。唐代科舉考試的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經』和『進士』等科。

參加考試的人員主要是在校學生，其次是分散於民間的苦心鑽研儒經以及律學、書學和算學等專門學問的知識分子。

唐朝的學校，分爲設在京師的中央級學校和設在州縣兩級的地方學校。設在京師的學校，根據所收學生的出身不同，又分爲以下六類：

國子學——收三品以上高級官吏的子孫

太學——收五品以上中級官吏的子孫

四門學——收七品以上低級官吏的子孫和一般地主的子弟

律學、書學、算學——收八品以下小官吏和一般地主的子弟。

以上六類學校同屬於國子監，國子監的最高長官爲國子祭酒，負責管理教育事務。在校學生的首要任務是熟讀儒家經書。故在我國長期的封建社會中，『知識分子』和『儒生』往往是同義語。儒家的倫理道德是知識分子乃至全體百姓立身行事的標準。朝廷更是把儒家思想作爲治國平天下的理論基礎。

李隆基是在戰勝了武氏和韋氏集團的勢力後登上皇位的，所以儒家的正統思想對鞏固其來之不易的政權尤爲重要。他一方面限制被武則天大加推崇的佛教的發展，另一方面，採取一切實際措施提高孔子及其儒家的地位。開元二十七年（七三九），玄宗封孔子爲『文宣王』，改孔廟爲文宣王廟。親自注解并書寫《孝經》，刻於高達五百九十厘米的巨型方柱形石碑上，立於國都長安城務本坊的國子監內，以向天下人表明他推行的是『孝悌』爲本的儒家思想的治國方針。

『安史之亂』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轉折點，從此後藩鎮勢力愈加擴張，朝廷權威日漸下降，中央集權制度面臨動搖和崩潰的危險。順宗、憲宗等幾代皇帝也都曾爲削弱地方割據勢力、鞏固中央集權進行了一些改革措

施，但終究成效甚微。反而，宦官的勢力愈來愈大，達到可以任意廢立皇帝的地步。在這樣的形勢下，一些有識之士主張進一步推崇儒學，企圖以儒家的『尊王室』、『正名分』的思想來鞏固搖搖欲墜的封建政權。

鄭覃就是當時的有識之士之一。他為人剛正不阿，直言敢諫，反對當時朝廷內外結黨營私之風，對藩寇重兵在境憂心忡忡，建議皇帝『稍減游縱』，『留心政事』，『用之有節』。鄭覃在憲宗、穆宗和敬宗朝，曾任諫議大夫、御史中丞、京兆尹等職。唐文宗李昂繼位後，先拜鄭覃為左散騎常侍，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後又拜工部侍郎。由於鄭覃『經術精深，諄篤守正，帝尤重之』（《新唐書·鄭珣瑜傳》）。

大和四年（八三〇），鄭覃向文宗上奏：『經籍訛誤，博士相沿，難為改正。請召宿儒奧學，校定六籍，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舊唐書·鄭覃傳》）。唐文宗當時本來已採納了鄭覃的建議，但由於朝廷內部的政治鬥爭和人事變動，鄭覃的這一建議未能付諸實施。

隨著朝廷內部政治形勢和人事關係的變化，大和六年二月，又恢復了鄭覃的侍講學士職務。大和七年五月，鄭覃被提拔為御史大夫，同年十二月，唐文宗下詔令鄭覃主持鐫刻石經。《唐會要》卷六六載：『其年（大和七年）十二月，勒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壁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在石經的最後（第二二三至二二四面石上）刻有一段後記性的文字：

『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字樣等都計六十五萬二千五十二字大唐開成二年丁巳歲月次于亥日維丁亥』。

由此可知，唐石經是在開成二年的九月二十六日最終完成鐫刻任務的。因刻成於開成年間，故後世稱之為『開成石經』。

二、『開成石經』的內容

『開成石經』其規模之宏大，內容之豐富均遠遠超過了東漢之『熹平石經』和曹魏的『正始石經』。它猶如一

座內容浩繁的石質書庫。除刻《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孝經》、《論語》、《爾雅》十二部經書之外，還將唐代宗大曆十二年（七七七年）張參所編的《五經文字》和『開成石經』刻石過程中負責校勘經書字體的官員唐玄度編撰的《九經字樣》一併刻石，附於石經之後。

《周易》排在石經之首。《周易》又稱為《易經》，內容分為『經』和『傳』兩部分。它主要是通過八卦的形式推測人類社會和自然界的變化，並指出宇宙萬物的變化是由『陰』、『陽』兩種物質作用的結果，具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

《尚書》又稱《書經》，是我國上古的一部文獻匯編，保存有夏、商、周時大量的歷史資料。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本稱《詩》，約成書於春秋時期。因漢代人毛亨為其作傳，又稱《毛詩》，後列為儒家經典之一，故稱《詩經》。

《周禮》本稱《周官》，內容包括周王室的官制及戰國時各國的典章制度。因經過孔子修訂，其內容又加進了儒家的思想和理論。

《儀禮》又稱《禮經》或《士禮》，是春秋戰國時期一部分禮制的匯編。

《禮記》是秦漢以前各種禮儀論著的選集。

《春秋三傳》：《春秋》一書，本為春秋時魯國的史官所作的編年體史書，相傳孔子曾加以修訂，因此《春秋》原文稱為『經』。後來對《春秋》經文又有幾家解說，傳世的有《春秋三傳》，即《左傳》、《公羊傳》和《穀梁傳》。

《孝經》，相傳是孔子弟子曾參所著。唐明皇李隆基親自注《孝經》并作序，於天寶四年（七四五年）玄宗御書，刻於巨型石上，立於國子監，稱『孝經臺』。『開成石經』中的《孝經》，完全以唐玄宗御注本刊刻。

《論語》，是孔子的弟子和再傳弟子關於孔子言論的記錄。

《爾雅》，爲我國歷史上最早的一部解釋詞義的詞典，是漢初學者綴輯周代至漢代諸書訓詁，遞相增益而成。《五經文字》，係唐代宗大曆十二年（七七七）張參所編。

《九經字樣》，爲唐玄度所編。在刻唐石經之前，由唐玄度負責校定全部經文，他對於張參所編之《五經文字》一書中有遺漏及有疑誤之處，加以修定和增補，編成《九經字樣》一卷。

十二經與《五經文字》和《九經字樣》共刻於一百一十四塊石上，每塊石兩面刻，共二百二十八面。每石高二百一十五厘米，寬八十五厘米——九十八厘米。

大概是由於爲了便於閱讀和拓印及便於拓片的裝訂和保存，在排版方式上，一改漢魏石經和一般碑石的一行直下式，每面石由上至下分別刻八排文字，每排三十六至三十九行，每行十字。每經以卷爲單位，以排爲順序跨石排列。卷名爲隸書，經文爲當時通用的楷書。碑上署名的書寫人有陳玠、艾居晦、段絳等四人（泐缺一人名氏）。明朝人趙嶠在《石墨鐫華》中評論：『其用筆雖出衆人，不離歐、虞、褚、薛法，恐非今人所及。』《開成石經》字體基本上較規整、一致。

《開成石經》因系朝廷主持刊刻，故凡經文中出現開國皇帝和文宗以上七代祖的名字，均按『天子事七廟』的古制予以避諱。避諱的方法是將先祖的名字缺劃或少點，大多是缺末劃，如淵字寫作滯（避高祖諱），世字寫作『卩』，民字寫作『卩』（避太宗諱），豫字寫作『𠂔』（避代宗諱），純字寫作『𠂔』（避憲宗諱）。凡肅、代、德、憲、穆、敬七代祖的名字均避諱。高宗諱治，中宗諱顯，睿宗諱旦，玄宗諱隆基，當朝皇帝文宗諱昂皆不避。

三、《開成石經》的搬遷

《開成石經》原立於唐長安城內的務本坊國子監講論堂之兩廊，本來的用意是爲治國之本、示萬世之法。同時也作爲範本讓士子們校對，以達到儒經在文字和音義上的統一，從而進一步擴大儒學的影響。然而，在這項

宏大的刻經工程完成僅僅三十多年，就爆發了以王仙芝、黃巢爲首的農民大起義，起義軍攻入長安。最後，起義軍的部將朱溫投降了唐王朝，被搖搖欲墜的唐王朝封爲宣武節度使。結果，野心勃勃的朱溫很快控制了唐朝天子。天祐元年（九〇四），朱溫脅迫唐昭宗離開故都長安，遷都洛陽，並對長安城進行毀滅性的破壞，使這座已有三百年歷史的繁華都城一舉不復存在。如今我們從唐人的一些詩句中可以窺見當年長安城被毀的情景，如子蘭在《悲長安》詩中寫道：『何事天時禍未回，生靈愁悴苦寒灰。豈知萬頃繁華地，強半今爲瓦礫堆。』

長安城既已被毀，當年立於城內務本坊國子監的『開成石經』雖然幸存，但也是處於瓦礫堆中。天祐年間（九〇四——九〇六），駐守長安的是右國軍節度使韓建。爲便於防守，面對一片廢墟的長安城，韓建對其進行了縮建。縮建後的新城，僅包括原長安城中百官衙署所在地的範圍。而原置於國子監內的『開成石經』既在瓦礫之中又處於縮小後的新城的郊野。

那麼『開成石經』何以能基本完好的保存至今呢？這和歷史上有識之士幾次對石經保護性的搬遷有着直接的關係。根據現藏西安碑林的北宋建隆三年（九六二）刻立的《重修文宣王廟記》碑、北宋大中祥符二年（一〇六九）刻立的《永興軍文宣王廟大門記》碑和北宋元祐五年（一〇九〇）刻立的《京兆府府學新移石經記》等碑的記載以及近代人的考證，原立於唐長安城國子監內的石經，系分別由唐末右國軍節度使韓建與五代朱梁時鎮守長安的劉鄩先後由城外遷入縮建後的新城城內的。遷置的地點是唐朝尚書省西隅（唐尚書省的大致範圍在今西安市北大街以西，北廣濟街以東，鼓樓以北，西華門大街以南。其西隅，當在今廣濟街以東附近地區）。

北宋時任陝西轉運副史的呂大忠，大概因受其胞弟金石學家呂大臨之影響，尊經重道，在任期間，看到唐刻石經所處的環境是『地雜民居，其處窪下，霖潦沖注，隨立輒倒，埋沒腐壞……』（見《京兆府府學新移石經記》碑）。決定將石經遷置於『府學之北墉』。此次搬遷是在北宋元祐二年（一〇八七）。

對於呂大忠此次搬遷石經學術界研究的結果，觀點一致。而目前尚存爭議的是對《京兆府府學新移石經記》碑中記述的『府學之北墉』有兩種看法，於是就產生了唐石經的『二次搬遷』和『三次搬遷』之說。

武伯綸先生沿用明清以來的流行說法，認為碑文中『府學之北墉』即今碑林所在地——西安市三學街。結論是石經只經過兩次搬遷，此為『二次搬遷說』。（見武伯綸：《西安碑林簡史》，《文物》一九六一年八期）。

近年來，路遠先生又根據西安碑林中保存的北宋至和元年（一〇五四）刻立的《京兆府小學規》碑和金正隆二年（一一五七）刻立的《京兆府重修府學記》碑和《類編長安志》中收錄的《宋京兆府移文宣王廟記》碑等資料進行了考證，認為呂大忠搬遷唐石經時府學不在今碑林附近，而是在『府城之坤維』，即當時府城之西南部。北宋崇寧二年（一一〇三）由京兆府府帥虞策主持，將京兆府府學、文廟和石經一併遷至『府城之東南隅』，即碑林現址。此為『三次搬遷說』（見路遠：《西安碑林初創時期若干問題的再探討》，《文博》一九九五年三期）。

四、『開成石經』的現狀

『開成石經』已歷千年之久，幾經搬遷，而至今仍基本保存完好，整齊地陳列於西安碑林第一展室。《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陳列於東部，《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陳列於西部。從宏觀看，石數尚全，文不空缺。而從微觀看，有些碑石及文字已非原貌，這是由人為與自然諸因素所致。

對於石經的修改與補刻等工作，在唐代已開始。石經中《五經文字》卷尾刻有『乾符三年孫毛詩博士自牧以家本重校勘定，七月十八日書，刻字人魚宗會』等文字。所以清人錢大昕在《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中云：『自開成初刻以後幾經後人之手，乾符修改一也。』

陝西省文管會於一九六一年組織力量對『開成石經』進行過一次校勘工作，校勘發現經文改鑄多處，改鑄的

方法是將原有文字磨去，在磨後的低凹處重刻文字，或改全字，或改一字之偏旁。在校勘中還發現，除個別字改鐫之外，還有四通碑石爲開成以後重刻和補刻。

第五十七石（正面刻《儀禮·鄉射禮》篇，背面刻《儀禮·燕禮》篇），此石排版方式及文字風格與原刻石經均有區別。碑兩側留有十厘米的寬邊，每排間的兩條橫綫較粗且間距稍窄，最下邊有一條橫綫（其它碑均無）。經文中將『純』字仍寫爲『紉』。校勘者認爲此碑當系乾符年間校勘石經時重刻。

第五十四石（正面刻《儀禮·士昏禮》篇，背面刻《儀禮·聘禮》篇）和第七十六石與第七十七石（正面刻《左傳·宣公上下》，背面刻《穀梁傳·成公第八》和《左傳·襄公第九》）。此三通碑石文字大小不一，刻工較粗疏，經文中諱『成』、『誠』、『信』字（朱溫之父名誠，祖父名信），由此判斷此三碑爲朱溫所建的後梁時補刻（見朱捷元、劉最長：《『開成石經』校勘記》，《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二年六期）。

明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陝西發生強烈地震，『傾陷廬舍甚多』，立於文廟之北的『開成石經』也被震倒。據《明史·五行志》記載：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壬寅，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聲如雷。渭南、華州、朝邑、三原、蒲城等處尤甚。或地裂泉涌，中有魚物，或城廓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或一日數震，或累日震不止。河、渭大泛，華嶽、終南山鳴，河清數日，官吏、軍民壓死八十三萬有奇。』清代人王昶在《金石萃編》卷一百九十中曾有『嘉靖乙卯地震，石經倒損』的記載。察現存之石經，有四十塊被折爲兩段，大部分均有程度不同的損傷，一部分碑文殘缺不全，致使無法通讀。

明萬曆十六年（一五八八），由左布政使寧夏巡撫姚繼可倡議并責成咸寧、長安兩縣知縣和縣丞具體負責，西安府學和咸寧、長安兩縣縣學的教授及訓導主持施工，對被地震破壞的石經進行整修，對所缺之字另備石補刻。

關於明萬曆十六年石經補字的有關情況，今保存在西安碑林的萬曆十七年刻立的《重修孔廟石經記》碑的碑文記載得較為詳盡，碑文在敘述了石經的重要性及幾次搬遷之後，接着記述此次的整修與補字工程情況：『歲月既久，印摹者多，漸有磨滅殘闕不可讀之庇，左布政使今寧夏巡撫姚公閱之，嘆曰：『經所以載道也，字所以翼經也，文字既殘，經籍就敝，道斯因之墜矣。……遂於其事請於撫、按兩臺，詢於藩、臬諸司，計於府縣，命督工修復焉。凡點畫失真者正之，苔蘚污者新之，泐而欲敬者理之，文義斷闕者稽群書補之，凡五閱月而石經完。』碑文中還記述了參加補字工作的人員分工情況，『訂補殘缺，則西安府學教授曹光啓，訓導葉時榮、薛繼愚、牛國賓，稍一本。咸寧教諭石可大，訓導管繹如、楊千庭。長安學訓導王吉元、郝邦宰。』

在一部分補字刻石上也刻有負責補字工程的人員名字，與《重修孔廟石經記》碑的碑文所記相符，如在《周禮》補字的最後一塊石上刻『萬曆戊子西安府學訓導薛繼愚，生員王堯典。張尙德刻』。在《儀禮》補字之後刻『大明萬曆戊子春三月吉，補經府學官葉時榮，蜀綿州人。生員王堯典、王汝魁。鐫字匠卜大臣。』

王埏，字白衡，號竹溪，河南太康縣人，由戊辰進士，前任巡撫，甘肅服闋，萬曆十四年十月內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

參加補字的西安府學，咸寧和長安縣學的生員，在碑上留名的除上列的王堯典、王汝魁之外，還有鄭承恩、馬攀龍二人。另外，大概是便於刻字質量的檢查驗收，故『物勒工名』，不少補字刻石的邊上用小字刻有刻字匠人的名字，目前能看清字迹的有：卜大臣、卜大慶、張尙德、高應魁、張尙信、李界等人。

如果說唐文宗時刻立的十二部內容浩繁的儒家經典是對中華文化的一大貢獻，而明代在『開成石經』的所在地——西安府學，由那些教授、教諭及生員們經手鐫刻的石經補字，同樣也是一件彪炳後世的豐功偉業。

五、《開成石經》的特點、歷史價值及著錄

根據歷史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證明，我國歷史上曾經有七次規模較大的刊刻儒經的工程。而其中的東漢『熹平石經』、曹魏『三體石經』、五代時後蜀的『廣政石經』和北宋的『開封府石經』，或遺留部分殘石，或全部散失，唯唐『開成石經』和清『乾隆石經』保存完好。

唐『開成石經』是一套規模空前、鐫刻工程歷時最長、對後影響最爲深遠的石刻經書。它的特點可以概括爲以下幾個方面：

(一)內容豐富：東漢『熹平石經』只刻五部儒經，魏『三體石經』僅刻《尚書》、《春秋》兩部。而唐『開成石經』刻十二部之多，特別是將《爾雅》首次作爲儒家經典刊刻於石，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同時又刊刻了《五經文字》和《九經字樣》兩部有助於閱讀經文的著作，這對儒家經義的解釋和經學的傳播有重要的幫助和促進作用。

另外，『開成石經』在刊刻之前，由唐玄度負責將全部經文進行了校訂，以校訂本刻於石上。所以『開成石經』刊出後不僅僅是當時士子們讀經的範本，也是後世經學研究者的重要借鑒和依據，有助於經學的校勘工作。

(二)版式新穎：從遺留的漢魏石經的殘石看，均與普通的碑石一樣，爲通行，而唐『開成石經』一改前代的排版格式，每石兩面刻，每面分八排，每排若干行，每行十字，排與排之間以橫綫相隔。每排由右而左跨石順讀。這樣，以排爲序拓印裝訂成冊，可使某一經的某一章自成一冊，便於保存和攜帶。在印刷術尙不發達的時代，這種新型的版式對經學的傳播無疑會起到積極作用。

(三)規模宏大：『開成石經』共一百一十四石，二百二十八面，每石高達二米以上，這是我國歷史上歷次刻經中的數量和規模最大的一次。被譽爲中國歷史上時代最早和最大的一座『石質書庫』。

『開成石經』自北宋遷至今址以後，歷代金石學家與經學家多有研究及著錄，現按時代順序，簡列於後，以便參考。

- (一) 南宋 王應麟 《玉海》
- (二) 元 駱天驤 《類編長安志》
- (三) 明 趙 嶠 《石墨鐫華》
- (四) 清 葉奕苞 《金石錄補》
- (五) 清 顧炎武 《金石文字記》、《石經考》
- (六) 清 萬斯同 《唐宋石經考》
- (七) 清 朱彝尊 《曝書亭集》
- (八) 清 王朝渠 《唐石經考正》
- (九) 清 畢 沅 《關中金石志》
- (一〇) 清 錢大昕 《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
- (一一) 清 王 昶 《金石萃編》
- (一二) 清 杭世駿 《石經考異》
- (一三) 清 桂 馥 《歷代石經略》
- (一四) 清 馮登府 《石經補考》
- (一五) 清 嚴可均 《唐石經校文》
- (一六) 清 孫毓修 《唐石經考異補》
- (一七) 清 魏錫曾 《唐開成石經圖考》
- (一八) 民國 宋伯魯 《續修陝西通志稿》

(一九) 民國 張國淦 《歷代石經考》

(二〇) 民國 朱建新 《金石學》

(二一) 民國 《韶忍堂模刻唐開成石壁十二經》

附：《孟子》及《大學》、《中庸》

《孟子》，系戰國時儒家代表人物孟軻及其弟子萬章所著，共七卷。《孟子》在唐代尚未列入儒家經典，故唐刻『開成石經』中未刻《孟子》。

五代時蜀主孟昶於成都刻石經十一部，其中去掉了《孝經》與《爾雅》而增加了《孟子》一經，從而《孟子》始為儒家經典之一。

宋代隨着思想領域里理學的發展，孟軻的地位與思想愈來愈被理學家們所重視。南宋著名理學家朱熹，將《禮記》中的《大學》和《中庸》兩篇與《論語》、《孟子》相提并論，合編為《四書》，并為《四書》作注，稱為《四書集注》。朱熹之作得最高統治者的肯定，從此《孟子》正式由官方列為儒家經典之一。

明代，是我國儒學進一步發展的時代，明成祖朱棣下詔《四書》和《五經》為知識分子必讀之書，為科舉考試的重要內容。隨着《四書》的普及，孟子的地位也愈加提高，明嘉靖時稱孟子為『亞聖』，其地位僅次於孔子。此後，凡談及儒家學說，總是以『孔孟之道』相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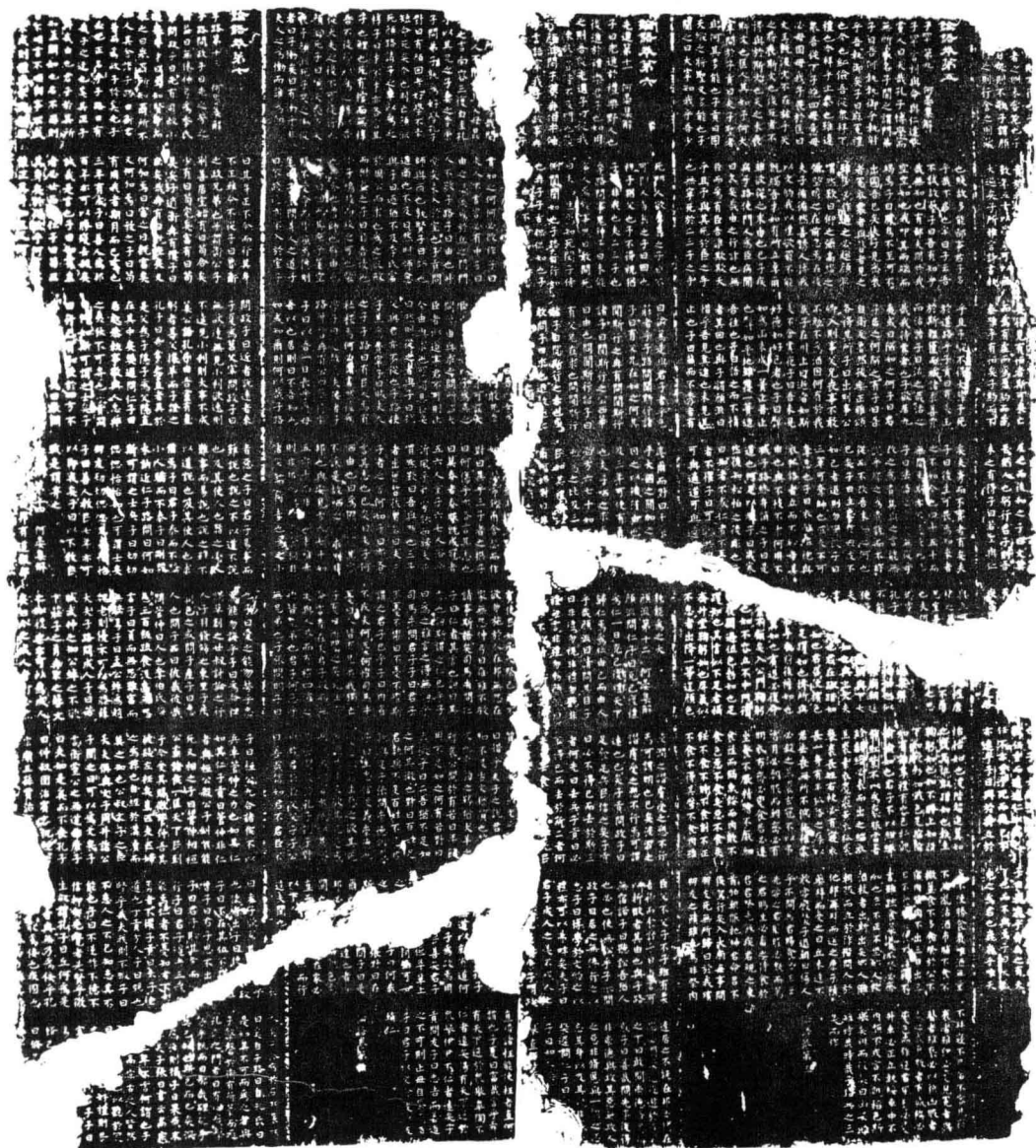
滿族入主中原，建立起統一的清王朝後，為收買廣大知識分子，鞏固其政權，對漢族傳統文化仍然十分重視，特別是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對經學大力提倡。康熙三年（一六六四），西安知府葉承祧、咸寧知縣黃家鼎、長安知縣梁禹甸等人共同發起和主持，刻《孟子》一部共七卷十七石，置於唐刻十二經附近。

清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陝西布政使麻爾圖校定《大學》和《中庸》二書文字，於七月至八月間，將二書

刻於兩石上，石大小與《孟子》刻石相同，立於西安碑林。現陳列於碑林第一室唐刻石經之旁。

『開成石經』之圖版，係用碑林舊藏的拓片剪裱本拍照。剪裱本對於碑邊缺損之字均未補裱，故圖版的內容有數處不能通讀，存在缺十字或缺二十字的現象。編者爲此甚感遺憾，特向讀者致歉！

《周易》卷首碑拓
全照



《論語》中卷五、六、七部分
碑拓全照